

【教育学 心理学研究】

#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教育述论

吴洪成, 宋云青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袁世凯作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及进行的教育活动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其中包括的主要内容有: 废除科举制度, 兴办新式学堂, 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推行实业教育和社会教育, 后又掀起复古主义教育逆流, 向封建传统教育让步、妥协。他以不同方式作用于清末民初的教育, 已成为教育转型或波折变动中不可忘却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袁世凯; 清末民初; 新式学堂; 教育改革; 复古主义教育逆流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2)05-0092-06

袁世凯出身官宦之家, 从小站练兵开始手握军权崭露头角, 到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权势显赫, 再到逼退清帝, 夺取民国政权走向政治巅峰, 这一生纵横捭阖、无限风光。直至晚年悍然称帝, 给其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污点。诚然, 袁世凯的作为及活动重心在政治、军事领域, 是近代中国风云际会的核心人物之一, 但是由于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子细胞, 且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内在的活力, 袁世凯自然也不能轻视忽略这一部分。事实上, 他以不同方式影响或作用于清末民初教育, 已成为教育转型或波折变动中不可忘却的重要因素, 因此也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居于一定的地位。本文拟从废除科举制度, 倡办新式学堂、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推行实业教育与社会教育及坚守复古尊孔的意识形态等5个方面对此加以探讨, 以弥补目前学界在该问题研究中的薄弱及欠缺。

## 一、废除科举制度

科举制源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 是中古以后一直沿袭未变的人才选拔制度。但到了晚清, 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动, 科举制因其成为新教育的桎梏而受到批判, 要求改革、废止的呼声不绝如缕。1901年, 张之洞等人上奏清政府, 主张科举与新设学堂并行, 并逐渐将人才培养与选拔责权统归于学堂。同年, 清政府迫于列强交逼, 危机加重, 尤其是《辛丑条约》的耻辱, 宣布实行“新政”, 新教育制度的建立尤为“新政”的要项及重心。1903年3月, 袁世凯与张之洞联名上奏《奏请递减科举折》, 斩钉截铁地剖析: “况科举之为害, 关系尤重, 今纵不能骤废, 亦当酌量变通, 为分科递减之一法”<sup>[1]571</sup>, 按年递减各项考试考中之额, 逐渐削弱科举, 进而广设新式学堂, 为国家培养现实急需的人才。“俾天下士子, 舍学堂一途, 别无进身之阶, 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 人才接踵而至不可胜用”<sup>[1]572</sup>。1905年初, 袁世凯与赵尔巽、张之洞等再次领衔上奏《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 指出废除科举制度的紧迫性, 要求清政府立即停科举, 推广学校。“欲补救时艰, 必自推广学校始; 而欲推广学校, 必自先停科举始”。“庶几广学育才, 化民成俗, 内定国势, 外服强邻, 转危为安, 胥基于此”<sup>[1]577</sup>。1905年9月, 光绪帝颁布上谕, 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自1906年科举考试停止之后, 各省官绅就竭力推进兴学活动。“申明宗旨, 闻风兴起, 多建学堂, 普及教育, 国家既获树人之益, 即地方亦与有光荣。经此次谕旨, 著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 以定指归而宏造就”<sup>[2]115</sup>。

收稿日期: 2012-06-12

基金项目: 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袁世凯与直隶近代新式教育——以保定区域为中心的考察”(201102068)

作者简介: 吴洪成(1963-), 男, 浙江金华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和教育学原理。

科举制的废除,作为清末教育制度最彻底的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必然,加速了传统社会的分解与转型,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教育改革本身。袁世凯在废除科举制度中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此举的动机是为了缓和清王朝统治的社会危机和内外压力,但科举制的废除在历史上是进步的,国外评论家甚至称其为“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sup>[3]336</sup>。

## 二、兴办新式学堂

科举制度的废除,促进了清末新式学堂的开办。提倡新教育,引进西方工业化时期形成的近代教育体制,建立新式学堂及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近代教育改革的趋势,是教育思潮激荡澎湃的主旋律。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评价道:“袁世凯凡举办一事,必兴一学堂,以求其学问,尤必编译书籍,以输入文明。”<sup>[4]43</sup>在“新政”时期,袁世凯认识到有了学堂才有人才,有了人才方能有“国之本”,国家才有可能兴盛,因此,当务之急是广设新式学堂以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遍之智能,上能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无地无学,无人无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sup>[1]577</sup>。新式学堂实际上肩负普及教育和开民智的重任,这就表明了他的教育观念已带有了现代教育的某些因素,而逾越了仅关注于培养科技实用人才的洋务派及洋务学堂。

开办新学堂,教育资金和师资是最重要的硬件和软件,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教育经费都从属国家财政,清廷对地方教育经费的来源和数额未做统一规定,各省施行各异,很是混乱。从客观意义上说,清末时期的兴学高潮是在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的艰难历史条件下推行的。于是,地方政府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超脱国家财政范畴开始大规模地自筹经费。考诸史实,为了筹措办学资金,各地大都尽其可能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办学资源,以解决教育经费的不足问题。清末“新政”兴学风潮中的袁世凯恰在直隶总督任内,他所面临的问题应该是普遍而共同的。

### (一)教育经费的筹集

1.对旧学款产的利用。清政府于1901年“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sup>[5]6</sup>直隶各省纷纷遵章改书院为学堂。这些学堂顺理成章地继承了部分原来书院的经费。如安平县书院“基金八千二百缗”归官立高等小学堂使用,“学田共计二十一顷七十八亩划归劝学所和女学堂为基产”<sup>[6]504</sup>。原有的书院院产划拨新式学堂使用,这样既解决了新式学堂的校舍问题,又节省了教育经费。

2.从税捐中筹集教育经费。袁世凯在《保属田房税契加捐中学堂经费片》中提出“以本地之财教本地之子弟”的筹款思想,规定:“绅民岁入在制钱三百千以上者,岁抽起百分之十或者五为公立小学之费,又不遵者,除名盗重案外,所有本户财产之诉立案不得奏请。”<sup>[7]4</sup>户捐和地稅比较稳定,使地方办学经费有了相对稳定的来源。

3.发行公债,投资企业,从中获取利息,充实教育经费。1905年袁世凯奏请以银120万两做抵,发行公债480万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省发行的公债,缓和了教育经费的困难问题。卢木斋任直隶提学使时征得袁世凯同意将约三四十万学款投资正在筹建的滦州矿务公司。此外,还发扬了古代书院“学田制”的传统,自主经营以学田为主的校产资源,以减缓办学经费的压力,如利用荒山、荒地种植开垦为学田,其盈利分红作为办学之资。

4.鼓励个人捐资办学。在兴办新式教育的过程中,袁世凯认识到振兴教育的重任仅限于政府的政策和经费支援是远不够的,应该有效地发动民众的力量。他率先捐献二万两白银,以作表率。同时给予捐助者以荣誉和精神方面的奖励。他曾上折为严修请奖称:“慨捐巨款,洵属见义勇为,深裨学务,且其经术湛深,通达时务”,“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一时士论望若泰山”<sup>[8]141</sup>。这种以政府嘉奖兴学先进的举措,既开通了社会风气,又解决了办学经费问题,一举两得。在袁世凯的倡导下,部分封疆大吏、士绅及盐商等纷纷倡捐办学。

### (二)办学师资的选聘与培养

师资是学务得以开展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各级各类教育的基础,可以说师范教育是学校教育的运行保障。维新派教育家梁启超曾在《变法通议·论师范》中提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sup>[9]144</sup>这一思想未引起重视,而梁本身无实权,未能将此想法付诸实施。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造成师资的严重匮乏。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明晓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他早在1902年8月奏请“设立直隶保定师范学堂”文中就指出:“中国士子向囿于章句帖括之习,于各种新学多未讲求,自难膺教习之选。各州县虽筹办学堂,而教习无人,课程未定,名为设学,实仍虚应故事,造就师范诚为刻不容缓。”<sup>[10]628-629</sup>由于遍设师范学堂,在当时仅凭国内定向教育

机构培养师资力量做法并不成熟,也无法满足新式学堂众多师资的客观需求。为大力发展新教育,袁世凯在师资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 1. 聘请外籍教师

兴办新式学堂之初,国内既缺乏合格的师资,也没有办理新教育组织管理的经验,需要借助于外籍教习的力量。为此袁世凯不惜重金聘请外籍师资。其聘任外籍教习的范围涵盖军队、教育行政和实业部门,包含日、英、美、德诸国人士,其中日本教习最多。清末直隶高等学堂、师范学堂,乃至于中等学堂,几乎每校都有外籍教师。这些服务于师范学堂的外国教习的成绩如何,因为没有确切的资料很难作出正确的评估。但是他们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实践西方教育模式以培养包括师资在内的专业技术人才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 2. 广设师范学堂

1902年11月根据袁世凯上奏《直隶保定师范学堂章程》的设想在保定设立保定师范学堂,招收各县举贡生员600名为学生,设完全、简易两科。1905年在天津创设直隶省立第一师范学堂。1906年设北洋师范学堂,招收本省及东北、华北各县学生400名,除了设有一年和两年半的简易科、专修科,尚有6年毕业的完全科,以培养高等师范专门师资。同年还在天津设立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专门培养女教师,成为全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堂。《学部奏派调查直隶学务员报告书》表明:至1907年,直隶全省各府州县设立的师范学堂以及传习所已经达到89所,学生4335人<sup>[10]</sup>。其数量及影响处全国上游水平,这也正是清末直隶教育一度位于全国各省前驱的重要缘由。

### 3. 派遣留日学生

清末15年间,中国出现一股强劲的留日教育思潮,留日学生所选专业以经济、法政以及师范为主。袁世凯重视官派留日教育,并鼓动与奖励自费赴日学习。直隶留日学生1901年为16人,1902年为25人,1903年77人,1904年172人,1905年不详,1906年454人,呈现直线上升态势。1907年仅留日归国的速成师范生就达200余人。留日学生学习归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紧张的矛盾。大多数留学生有较深的传统文化素养,在社会风潮的感染下,他们思想转变很快,虽然在日本的求学多带有速成性质,新知识远未系统,也不够丰富,但他们归国后在清末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管理及教学中仍然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 三、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学堂逐渐增多,但教育行政管理却严重滞后于教育形势的发展,呈现出体制混乱与矛盾重重的积患。旧日的学政体制弊端甚多,清代省一级教育官员学政只相当于专司视察学务的中央视学官,对于省内教育规范管理及协调缺乏组织功能及能力素养。“至学政属官,惟有教职”,“且教职之视学政,位供过悬”。原有的学政制度远不能适应地方学务发展。科举制废除后,围绕科举考试管理学务的礼部和国子监失去了教育行政机构的功用,社会急需统辖新式教育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重建。

袁世凯认为,科举之与学堂,情事既不相同,则制度亦应稍变。1902年8月,他率先在直隶地区进行教育行政改革,在省城设立学校司(后改为学务处、提学使司),为通省学务总汇之所,专司通省学校事务,下设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和编译处,分工协调,职责明确。袁世凯选取得力人员主持学校司事务,先后有胡景桂、严修等人担任学校司督办,尤其是严修担任督办期间,多有创举,极大地推进了直隶的兴学过程。各府、州、县、乡等设立劝学所作为基层性地方教育管理机构,要求设劝学总董1人,定时巡察各乡村市镇学堂,对学生进行指导和劝诱;劝学员数人,负责挨家挨户劝导学区内已届入学年龄的子弟入学,劝学的内容是“劝入学,劝买书,劝勿旷课,劝勿退学,以白话传之各村镇”<sup>[12]32-33</sup>,以推广学务。劝学所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直隶基层新式教育的发展。

据直隶督学机构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调查,“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直隶共创劝学所152处,居全国各省之首”<sup>[12]95</sup>。“直隶南和县在视学官(总董)巡视前一年,初等小学名额近五六百人,巡视后,今年顿增至一千三百名”<sup>[13]</sup>。这一制度在直隶试验颇见成效。1906年4月25日至5月13日间,政务处、学部《会奏遵议裁撤学政设立直省提学使司折》,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折》以及学部《奏拟劝学所章程折》等教育政策文件紧锣密鼓地颁发,通行全国,以直隶的组织方式、建置措施及经验积累为基础,省建立提学使司、州县建立了劝学所和省县的视学巡察制度。可见,清末直隶省地方教育行政管理的改革及实践,开全国风气之先,进一步完善了近代中国教育行政系统,成为促进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保障机制。

总之,在1905年中央学部作为全国主管教育行政机构建立以后,直隶省作为地方教育行政机构范式的标准

或参照物发挥着实际的示范作用。可以说,此举为中国近代地方教育行政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 四、推行实业教育、社会教育

在清末直隶“新政”改革中,实业教育业已占有—定地位。1905年学部成立之前,中国的实业教育以适应军备、交通及财政需要为主旨;所有学校及馆所,均由政府设立,培养技术人才,供国家使用。学部作为教育行政组织机构成立后,开始从事于地方实业教育,包括社会经济,如工艺、商务、农艺、蚕桑等各方面科技知识的传播及实用人才的培养。

袁世凯重视实业,他在督直期间积极倡导发展工农业生产,为此就需要技术与人才的支撑,其中直接效应最明显的便是实业学堂。袁世凯对此采取了务实的做法,认为自应按照地方需要广为设立,“其设科种类不必求全,以本地方物产制造之所宜及所需要为主”<sup>[14]16</sup>。1903年,袁世凯委派周学熙在天津创设直隶工艺总局。直隶工艺总局创办以后,培养了大批实业技术人才,同时对各省前来观摩考察者提供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援助。从1904年10月到1907年7月,先后毕业生已有700余人,分赴省内外充做工师、匠目,促进了全国工商业的发展。据宣统元年(1909年)学部总务司所编教育统计表记载:直隶农、工、商实业学堂达23所,培养学生达1023人<sup>[10]61</sup>。

袁世凯认识到要提高实业竞争力,必须发展教育和科技,使教育具有现实性基础和实用性走向。为此,他认为,实业教育课程除了设立相应教育机构或团体组织实施之外,还应渗透、甚至具体体现在其他类型的教育机构,甚至普通中小学教育之中,这不仅有利于实业教育实施途径的多样化,而且有助于新式教育的现实性定位。在《直隶师范学堂暂行章程》中提出开设“专斋”课程“农学科”,学习“农事大要”、“农学理财论”、“农示范论”等,还促使清廷在颁发的《直隶小学堂暂行章程》中也设“农学”课程。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器,聘请日本人指导,经营保定郊区200余万株桑秧和小站400余顷稻田。日本农学学士楠原正三被聘为农业顾问,我国最早的高等农业院校之一直隶农务学堂(今河北农业大学)就是楠原正三与道员黄景赴日考察后创办的。农务局附设农业学堂,教授蚕桑种植及糖酒制造之法。此外,该局还曾开展农产品评议会、试办农会、劝导种树等活动来推广先进技术。应该说,这些主张及实践活动是对近现代工商业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教育内在机制的深刻理解,反映了其深远洞察力。

袁世凯积极倡导实业,兴办了许多实业学堂,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有力地推动了直隶的农工商矿业和实业教育的发展。

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期间,清政府对推广社会教育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看到民众的无知是经济停滞、生产工艺落后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又顾忌使民众具备西方民主和科学的知识观念会威胁自身统治的安全。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由清廷推动社会教育的发展自然是在徘徊、彷徨中缓慢运行的。在清末“宪政”这一最后5年的“回光返照”中,清廷被迫放宽控制,采纳民意,所谓“下诏求言,广开言路”。在这种背景下,朝野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社会教育的相关问题。

袁世凯认识到社会教育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所起的积极作用,于是对此积极倡导并作为实施新政“开民智”的重要手段。袁世凯热衷于办报纸,认为报纸记载京外各省政要,后附各国新政近事以及农工商矿各种学术。民众有机会及条件阅览,久而久之即可风气日辟,耳目日新。为此,应积极开设阅报处,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保定阅报处简章》所示:“学堂教育,一时未能普及,多以阅报人,即多—晓事人,智识普及,莫此为要。本社所备报纸,专以输入文明、开发智识为主。”<sup>[15]371</sup>此外,在袁世凯督直期间,各府、州、县还踊跃创办图书馆、普通科学馆、宣讲处、夜班传习所等不拘形式、灵活多样的机构与设施进行社会教育活动,对提高直隶民众的整体文化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

#### 五、掀起复古主义教育逆流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变革、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历史人物在这一过渡时期的思想意识、态度立场等各方面都带有多元复杂性。袁世凯作为晚清重臣、封疆大吏,主要从官僚军阀立场出发思考教育问题,便自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不可避免留有封建思想的残余。

早在1912年7月,袁世凯北京政府统辖下的教育部决定把“孔子生日”列入学校自定义仪式中,这可算作守旧与复古势力徘徊教育界的明晰表现,也是复古教育思潮酝酿的先声。1914年6月教育部发出“拟于中小学校修身及国文教科书内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并审定各教科书教授要目等办法”。“各书坊各学校教员等编纂修

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书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即或兼及他家亦必择与孔子同源之说”<sup>[16]204-205</sup>。1914年12月,教育部提出要对民国初年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核心就是恢复读经。在1915年袁世凯政府出台的《特定教育纲要》中提出了“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的办学宗旨,这就使得学校尊孔读经在制度上得到了保证。袁世凯对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方案进行篡改,重新提出的教育宗旨带有明显的封建性和等级性。他的尊孔、读经、祭天等举措,是为其帝制制造声势,这也体现了教育文化与政治统治之间互相印证的关系。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任命的教育总长汤化龙对辛亥革命后女子取得受教育的平等权利颇为不满,在1914年的《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要求禁止设立女子政法学校,提倡贤妻良母主义,使女子“可以维持家庭而已”。同年12月,教育部拟定《整顿教育方案草案》称民初倡导办女学流弊甚大,需严加整顿,女子教育必须“标示成良妻贤母主义,以挽其委琐龌龊或放任不羁之陋习”<sup>[16]218</sup>。这些举措与袁世凯之前促成设立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推广女子教育的种种努力相比较,大相径庭,无疑是一种倒退。这也充分显示了时代的复杂性和袁世凯自身经历、角色多元化所造就其前后思想行为的矛盾性。

袁世凯在复辟帝制走向高潮的1914—1916年之间,篡改民国教育方针,复辟封建文化教育,推动中小学尊孔读经,主张女子教育回归贤妻良母主义,这些都是近代教育发展的逆流。所幸的是这股逆流持续时间较短,又受孙中山、蔡元培、黄兴、宋教仁等民主革命派抵制,其实际影响不大。在1916年6月6日“洪宪帝制”闹剧失败后,中国的教育又重新回归新式教育的路向。据《教育杂志》第8卷第8号“记事·大记事”所载:1916年7月12日,黎元洪任命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范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参仿英美两国教育制度,提倡“军国民教育”。由此可以推论:整个民国初期的教育就整体而言还是一种发展进步的历史走向。

## 六、历史的评价

作为当代的学人应辩证地认识历史,客观具体并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这就需把袁世凯还原到当时教育转型与变动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综合考量,在复杂历史背景中还原人物。

袁世凯从领命清政府建立起中国最强大的北洋军,到逼退清帝,再到夺取民国政权站到国家的最高点,一举一动不论对错都将对这个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他在权力中成长,对权力有着本能的看重与追求。或许是现实环境转变了人的信念,或许是当时形势的复杂使他的权力自主受到种种制约,或许是出于对专制权威的迷恋及极端的权力欲,袁世凯最后逆历史潮流而动走上复辟道路。这些都有与其教育历程中色彩或特点若干节律运动的契合之处,折射出社会政治与教育变动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

清末袁世凯其人在废除科举制度上不遗余力、功不可没,新政期间在山东和直隶的地方教育活动曾在全国教育界产生积极的影响。民国初年,他倡议尊孔读经、主持祈神祭天等封建复辟等行为方式又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步伐。因此,不能完全抹杀袁世凯对中国教育发展曾发挥过的积极作用,也不能无视其封建复辟倒行逆施给中国教育带来的危害。

袁世凯一方面持有清朝重臣遗老的遗风,另一方面又适应社会的形势变化积极求变,这种守旧与进步的矛盾冲突都在这位由封建制转化为共和制过程中的社会权要、政治家身上得以汇聚与集中反映,分裂而又离奇地统一。民国时期国际外交与法学界元老顾维钧说:“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sup>[17]90</sup>袁世凯的一生,浓缩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与西、新与旧、强与弱、保守与进步、封建与民主在他身上有着不可思议的调和。袁世凯既是守旧派中的改革者,也是改革者中的守旧者。以这样的历史人物评议尺度或基调来分析袁氏的教育影响及历史担当是合适的,或许还能够从中寻觅可资借鉴之处。当然,从事这项严肃认真的工作非常艰辛,尚需要作进一步努力。

自小站练兵从事军事教育改革以来,时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教育思想及新式教育活动顺应改革潮流,一直是走在清末督抚官僚的前端。尤其是督直期间,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手中的权力能使得各种教育资源做到最大范围的整合和调配,与那些专注于兴教办学的学者相比,这是无可比拟的优势。学者拥有的单纯的思想力量是不够的,思想只有在强有力的防御体系庇护下才能生存。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家、教育家相比,袁

世凯对清末民初中国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有时更为直接。其督直期间形成的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社会教育思想与实践活 动,充分折射出他对教育问题的综合思考。可以说,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教育言论及其从事的活动,糅合新旧,杂融中西,贯通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政改革、民国伊始等近代中国的重要阶段,影响至为深远。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过渡时期,袁世凯推行的兼有新式与复古双重特点的教育理念和政策,在教育结构、教育内容、教育管理等方面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转型推波助澜;而我们褒扬清末新政时期的袁世凯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的同时,也不可忽略其消极的思想和行为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局部抗阻与障碍。

#### 参考文献:

- [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 [2]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3]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4]佐藤铁治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 [5]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 [6]刘祖宪.安平县志[Z].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 [7]佚名.督宪袁飭学务处妥议各学堂学生公费自费章程札[C]//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北京:北京益森公司,1907.
- [8]赵宝琪,张凤民.天津教育史:上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 [9]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10]璩鑫圭,童富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 [11]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文史资料:第25辑[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 [12]朱有瓛,戚名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 [13]佚名.查视天津县学务报告[J].直隶教育官报,1909(3).
- [14]归安,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Z].上海:广益书局,1925.
- [15]保定市教育局史志办公室.保定教育史料类编[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 [16]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 [17]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On Yuan Shikai and the Educa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u Hongcheng, Song Yunq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As a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Yuan Shikai was very important in the militar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any other areas. His education thought and activities had important influence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abolish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found new school, reformed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implemented industry educ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set off the revivalism education reflux later, and concede to feudal traditional education. He influenced o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ducation in different ways, and became an indelibl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or twists changes.

**Key words:** Yuan Shikai;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new school; educational reform; revivalism education reflux